

中國語言學

第二輯

山東教育出版社

中國語言學

第二輯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2辑/《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328-6237-5

I. 中… II. 中…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366 号

中国语言学(第二辑)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5.5 印张
字 数: 3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237-5
定 价: 2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学》(第二辑)

王 庆	心理达及距离与象似原则——与沈家煊先生商榷	(1)
徐思益	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8)
洪成玉	汉语发展的渐进性和系统性——学习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体会	(15)
郭 锐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的介词悬空和介词删除	(23)
聂 娜	《证“〈诗经〉押韵”一文数理统计方法分析	(37)
王 宁	黄易青 章太炎先生成均图的结构及其元音系统	(40)
虞万里	《广韵》姓氏来源与郡望音读研究	(51)
张民权	吴棫《韵补》与宋代语音史问题——兼论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处”的语音依据	(65)
万献初	《经史动静字音》别义异读的音义考辨	(85)
汪 锋	孔江平 武定彝语松紧音研究	(98)
曾晓渝	高 欢 广西融水诶话同音字汇	(119)
李 蓝	秘密语四种	(141)
赵大明	《左传》连词“以”的功能及其与介词的区别	(151)
姚振武	上古汉语个体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的发展以及相关问题	(164)
张 赓	论汉语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语序的演变	(178)
吉常宏	《古人名字解詁》增補稿	(186)
汪少华	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社会性再论唐诗的“床”	(205)
【笔谈】		
衍景行	为了语言学更“普通”些	(217)
赵人天	“数字竞赛”危害性必须重视 “核心期刊”硬规定亟需废除	(221)
钟 闻	王力学术讲座开讲的现实意义	(224)
【转载】		
郭锡良	也谈语法化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26)
刘勖宁	“多元一极”模式与中国的语言社会 原载《中国社会语言学》2004年第2期(总第3期)	(232)
稿约		(242)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Second Volume)

Wang Qing: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Iconicity—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Shen Jiaxuan	(1)
Xu Siyi: A Modality of Pragmatics of Confucius	(8)
Hong Chengyu: The Gradualness and Systematicity of Chinese Development—Some Thinking after Studying Prof. Wang Li's <i>Hanyu shigao</i>	(15)
Guo Rui: Preposition Stranding and Deletion in Modern Chinese and Classical Chinese	(23)
Nie Na: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i>A Demonstration For Shijing is Rhymed</i>	(37)
Wang Ning, Huang Yiqing: The Structure and Vowel System of the Chengyuntu of Zhang Taiyan	(40)
Yu Wanli: A Study of Sources of Surnames in <i>Guangyun</i> and Pronunciations of Surnames with Prestigious Origin	(51)
Zhang Minquan: Wu Yu's <i>Yunbu</i> and Some Issues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in the Song Dynasty	(65)
Wan Xianchu: A Study on the Semantics and Sound of Variations for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in <i>Jingshi Dongjing ziyin</i>	(85)
Wang Feng, Kong Jiangping: A Study on the Tense/Lax Sound in the Wuding Yi	(98)
Zeng Xiaoyu, Gaohuan: The Syllabary of Ei language, Rongshui County of Guangxi region	(119)
Li Lan: Four Kinds of Secret Languages	(141)
Zhao Daming: The Function of the Conjunction Word “Yi” in <i>Zuozhuan</i>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Propositions	(151)
Yao Zhenwu: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s and Structure of “Numeral + Classifier+Noun” in Old Chinese and Some Relevant Issues	(164)
Zhang Cheng: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Word Order of the Numeral Phrases and Head Nouns in Chinese	(178)
Ji Changhong: A Supplementary to <i>Guren mingzi jieku</i>	(186)
Wang Shaohua: A Revisit on Chuang in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stoms and Sociality of Language	(205)
[Conversation]	
Kan Jingxing: To Make Linguistics More General	(217)
Zhao Rentian: The Views on the Abolishment of “Quantit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Rigid Regulation of “Core Journals”	(221)
Zhong We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livery of Wang Li's Lecture	(224)
[Reprint]	
Guo Xiliang: My View of Grammaticalization	(226)
Liu Xunning: The Model of “Multiple Systems and One Center” and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232)

心理达及距离与象似原则

——与沈家煊先生商榷

北京师范大学 王 庆

《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首篇是沈家煊先生的文章^①，题目是《李白和杜甫：出生和“出场”——论话题的引入与象似原则》。正题很玄奇，副题我也感兴趣，便拿来一观。阅读之后，有一些问题想与沈先生商榷。

沈先生称，“最近看闲书看到朱鸿写的《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文汇原创丛书之一），其中最后一篇是《诗人多难》，讲唐代诗人的生存状态。全文共25段，每一段讲一个或两个诗人，按其出生先后排序。除首尾两段，其余每段都是开头第一句引入一个要讲的诗人，诗人通过这一句而‘出场’。”沈先生详细列举了朱文中每段的首句，择要如下：

- （六）在宋之问出生之后五年，陈子昂降临人间。
- （八）王之涣小张九龄七岁，是公元688年出生的。
- （十一）大约在王昌龄出生十年前后，王维出生。
- （十二）李白小王维一岁，是公元701年下凡的。
- （十三）高适小李白一岁，大约出生于公元702年。
- （十四）大约在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
- （十五）岑参小杜甫三岁，是南阳人。

随后，沈先生总结了朱文中介绍诗人出场的每段首句所用的两种句式：

- a. Y小X n岁。（李白小王维一岁。）
- b. X出生之后n年Y出生。（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

不仅如此，沈先生还有一个发现：a、b两种句式的使用“跟前后两个诗人相差的年龄有关系：相差1—3岁的，都用a式；相差10岁以上的，都用b式；介于其间的a式和b式混用，a式少，b式较多”。沈先生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使用情况？回答是，这是语言组织‘距离象似’（distance iconicity）的原则在起作用。具体说，有三个层次上的距离，大小是互相对应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客观时间、心理达及、话题接续。”沈先生由偶然看闲书得到的一个具体实例，最后竟然跟语言中话题接续上的象似原则建立了联系。我在此谨就以下几个方面求教于沈先生。

沈先生认为根据距离象似原则，客观时间的距离小，则心理达及的距离就小，话题接续的

^① 沈先生在《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此文的同时，又在《修辞学习》2008年第2期发表了《谈谈修辞学的发展取向》一篇文章。后者有七自然段约一半的篇幅同前文中的内容大致相同。另，文中讲到距离象似的原则时，沈先生列了一些参考文献，但按图索骥，却未能如愿，如“沈家煊1997”便不知所之，“Tai 1989”，而参考文献却为1994年，似乎应注明不一致的原因，或英文版发表于1989，或汉译文发表于1994。这些或许无伤于沈先生文章之大雅，我们只是想说明，严谨的学术论文也应该考虑到此类细小问题。

距离也小。反之,年龄差距大,心理达及距离大,话题接续的距离就大。果真如此吗?“心理达及的距离”,根据沈先生的解释,“是指人从记忆库中提取或从周围环境中识别某一个指称或陈述对象的难易程度,这种难易程度可以用提取或识别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沈先生在谈到朱鸿先生对唐代诗人的记忆存储时说:“作者的记忆库中有唐代的各位诗人,作者要开始讲述一位诗人,也就是要从记忆库中提取某个讲述对象。在作者的记忆库中出生前后相继的两个诗人相隔的时间距离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就如A——B——C——D那样,由此可以推断A和B存储的位置隔得比较远,B和C存储的位置挨得比较近。因此,作者在讲述完诗人A之后转而讲述B,要提取B就比较难,花费的时间较多,而讲述完B之后转而讲述C,要提取C就比较容易,花费的时间较少。”看了沈先生对朱先生记忆库的描述,我们不禁要问:朱先生记忆库中对唐代诗人的存储是否按诗人出生前后相继的顺序排列呢?我们怀疑沈先生的推测。如果果真那样排列,人的记忆库排列岂不太简单了,简直状如算子、列犹獭祭!沈先生理解朱鸿先生的记忆存储就如同图书馆的检索系统,可以按某一个设定的方式检索下去。但是,人类大脑中的信息存储方式极为复杂,要受到情景、内容、意义、传输方式、理解的不同层次、意象图式等多方面的影响,现代的认知科学还不能对人类的记忆存储能力作出十分令人满意的解释。Peter J. Hampson 和 Peter E. Morris 曾在人脑和图书馆之间作过类比,但他们也提醒大家注意,两者的信息检索方式有区别。“然而,在许多方面,人的记忆[存储]同图书馆[的信息存储]不同。例如,认为人的记忆存储位于某特定区域的想法可能有误;人的记忆的具体内容可能有助于这些内容的检索,但这种方式却不能用来检索图书馆的书。”^①关于人类的记忆和存储方式,认知科学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我们不能任凭自己的想象说话。

具体到诗人出场的问题上,因为王维和李白的年龄相差小,按沈先生的说法,所以在朱鸿先生来说,从王维到李白的心理达及距离就小,因此其话题接续距离就小。如果说这是沈先生的主观感觉,那么沈先生可能是在以己度人。我们觉得,心理达及距离跟人对所达及的事物或人物的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人对王维和李白并不熟悉,那么两人的生日即使相差仅一天,对这个人来说,他从王维到李白的心理达及距离也会很远。沈先生的推想基础是:唐代这些诗人对于朱鸿先生来说的熟悉程度相同,不分轩轻;而且,朱先生的大脑也类似“计算机”,对唐代诗人信息的存储同等对待,无喜好可言。我们觉得,沈先生的推想欠允当。敝人很喜欢唐诗,特别是李白的诗,自然讲到唐代诗人,心理上首先达及的是李白,而不是柳宗元;而敝人也粗读唐宋古文,讲到散文,以笔者的浅陋,比较熟悉唐宋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韩愈、柳宗元,并不因为王禹偁比韩、柳年纪小,离笔者的时间距离近,而先想到王禹偁。其实,沈先生的论文题目也透露,对大多数人来说,李白和杜甫的知名度可能要大很多,因此人们对于李白和杜甫的心理达及的距离要比达及王绩、元稹、孟郊的距离要小得多。或许也正因如此,沈先生用了“李白和杜甫”来作醒目的标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由此可见,对沈先生来说,他对于唐代诗人的心理达及距离也并不按客观时间距离来衡量。如果纯粹从客观时间距离来衡量,那么,沈先生文章的题目似乎可以改为“黄巢和李商隐”,因为这二人距离沈先生的客观时间距离比李白和杜甫要近。

其实,沈先生后面也讲到:心理达及距离同客观时间的距离“并不总是一致,在不一致的情

^① In many ways, though, the human memory is not like a library. For example, it is probably wrong to assume that memories are stored in particular locations. It is also likely that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memory can help in its retrieval, which is not so for books (P. Hampson & P. Morris, 1996: 158).

形下还得以心理达及的距离为准”。我们觉得，这是对的。有时候客观时间距离长，而心理达及距离却短；有时候客观时间距离短，而心理达及距离却长。如同爱因斯坦给不明白相对论的人讲相对论时所说：坐在一个火炉上，几秒钟也觉得长；而同一位心悅的美丽少女谈话，几个小时也觉得很短。可是，沈先生在论证朱鸿先生对唐代诗人的心理达及距离时却全以客观时间距离为据，这是否合理呢？沈先生还说：“说语言的组织完全遵循象似原则，固然是太绝对，不符合事实，大概也不会有人糊涂到真的这么认为。但是语言组织遵循象似原则的情形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多，这恐怕也是事实。”沈先生这句话说得相对客观一些。如果我们要证明语言中的象似原则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多，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语料、缜密的论证基础上。但沈先生在自己文章中的实际做法似乎与其所主张的有些背离。

二

沈先生还讲到几个心理学方面的实验，来证明心理达及距离同客观时间、空间距离成正比。这几个实验都是用从大脑中提取或识别不同事物所需要的时间来衡量人们对不同事物的心理达及距离。S. Sternberg(1969)的实验运用数字，“主试让被试先记忆一些数字序列（每个序列含3至7个数字），然后给被试一个探针数字，要他尽快说出排在其后的那个数字。例如先记忆的序列是38926，给出的探针数字是9，被试应该回答的数字是2。实验的结果是：序列越长，探针数字的位置在序列中越靠后，则被试作出回答的时间就越长。这表明被试在作出反应的时候是从序列的头一个数字开始朝后搜索，找到探针数字，然后说出其后的那个数字。重要的是，从头一个数字到探针的距离越长，则达到探针所需要的时间也越长。”Kosslyn, Ball和Reiser(1978)的实验“是先向被试展示一张虚构的岛屿地图，岛上有茅屋、树、石堆、井、湖、沙地和草丛七样事物，让他们先熟记这些事物在地图上的分布，直到他们能在空白地图上准确地标出这些事物的位置。然后主试大声说出一个事物的名称，要求被试在心理地图上聚焦于那个事物。5分钟之后再说出另一个事物的名称，要求被试转而聚焦第二个事物，并以按钮表示聚焦完成。实验结果表明：两个事物在地图上相隔的距离越大，被试在心理地图上转移焦点所用的时间越长”。

沈先生用这两个实验来证明：“信息在头脑中的存储有两种方式，构成一个序列的信息以线性的方式存储，例如语词信息；不构成序列的信息以意象的方式存储，例如地图上的信息。”上面已经说过，人脑中信息的存储可能异常复杂，似乎并不只有线性和意象两种存储方式。这一问题没有可信的结论，不多论述。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实验同我们日常记忆某一事物是本质不同的，十个数字对多数人来说可能熟悉程度大致相同，虚构地图对被测试者来说都很陌生。所以，以这两个实验所得的数据根本不能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程度有差异的事物类比。例如，我是山东人，在中国的地图上，说到山东某些地方时，如果我比较熟悉，我的心理达及距离就小，但说到某县某乡镇，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心理达及距离可能也很大。再如，我的仅有三岁多的小女儿，提到四川汶川时，她的心理达及距离要比北京颐和园的心理达及距离近得多。为什么？因为熟悉程度不同（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各种媒介中“汶川”的出现频率极高，小女经常看电视，虽然她还识字，但总是听到“汶川”一词，因此比较熟悉）。前一段时间，同一个朋友聊天，她在浙江师范大学读过四年书，讲到浙江的桐乡，我立即想到了茅盾和陆费逵先生。因为我知道桐乡就是从茅盾先生开始的，后来到了中华书局工作，学习了局史，才对陆费逵先生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我对于桐乡一无所知。虽然我知道浙江有个桐乡，但位于地图上具体

哪个地方,我并不清楚,后来查了半天才在地图上找到。如果,换一个故乡是桐乡的人去查地图,说得过头一点,闭着眼睛大概也能摸到,其心理达及距离太小了。因为浙江师范大学在金华,谈话中我问道这位朋友是否知道金华现在所称的“何氏三杰”^①,她茫然无知,心理达及距离太大,无法达及。说到“何氏三杰”,我这个从未到过浙江的人要比她这个在金华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人的达及距离要小得多。原因是什么?很明显,同熟悉程度有关,因为我仔细读过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参加过同何先生的座谈会。同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到很多。例如,据说毛主席有一次会见一位干部(我忘记了姓名),当知道这位干部是陕西韩城人时,毛主席马上说:“你们韩城可有一位大名人呢:司马迁。”从此,一提到韩城,我心理达及的就是司马迁,虽然从未到过韩城一步。

通过沈先生引用上述两个实验的数据和结论,我觉得有一些建议要表达。语言学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不断吸取不同学科领域的先进研究成果,但我们也反对不加分析辨别地搬用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而且,有一点最需要注意,实验室的实验过程都是在相对简单、许多影响因素得到相对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其解释力相对有限,不能将它们过度泛化。Peter J. Hampson 和 Peter E. Morris 认为现代心理学要充分理解一些复杂的认知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对由实验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心理学家完全理解这些认知的‘宏观块’——手迹和认知地图——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以实验室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仅仅只是处理简单的概念组合和关系结构,距离达成一个有关高级智能的真实的普遍结论,足以解释[图式和认知地图]这样的问题,似乎还需要一些时间。”^②

三

谈到“话题接续的距离”时,沈先生又做了以下论述:“话题接续的距离是指作者在行文中从一个话题接续另一个话题时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当然是直接的距离小,间接的距离大。比较:a. 李白小王维一岁。b. 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单从形式上看,a 句‘李白’放在句子头里,而且‘李白’和‘王维’挨得比较近;b 句放在句子头里的不是‘杜甫’而是高适,而且‘杜甫’和‘高适’隔得比较远。在讲述完王维之后要开始讲李白,上来第一句‘李白小王维一岁’,‘李白’放在头里,这是李白直接登场,李白接续王维的距离小。在讲述完高适之后要开始讲杜甫,上来第一句‘在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这是通过高适间接引入杜甫,‘高适’放在头里,杜甫接续高适的距离大。另一方面,接续距离小的用的是紧缩的形式 a,‘李白’和‘王维’挨得近;接续距离大的用的是松散的形式 b,‘杜甫’和‘高适’隔得远。显然,跟这两种形式对应的正是上面说明的两种不同的时间/心理距离。”沈先生认为,讲述李白的一段,李白被放在句首,是李白直接登场,并由此看出,李白同王维的接续距离小,反映了朱鸿先生从王维到李白的心理达及距离也小,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李白仅仅小王维一岁,客观时间距离小。而讲杜甫一段,放在句首的是高适,杜甫通过高适间接登场,句法上的接续距离大,反映了朱先生从高适到

① 不久前听说,金华市政府为以何炳松、何炳棣、何德奎三人为代表的金华北乡何氏成立纪念馆,三人被誉为“何氏三杰”。

②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psychologists fully understand these “macro-chunks” of cognition: scripts and cognitive maps. ... Laboratory-based research is only just beginning to cope with simple conceptual combinations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s; it is likely to be some time yet before a truly general account of high-level knowledge is produced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problems like this (P. Hampson & P. Morris, 1996: 158).

杜甫的心理达及距离也大,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杜甫小高适十岁,客观时间距离大。不仅如此,在句子中,李白和王维挨得近,仅仅相距一个“小”字;而杜甫和高适隔得远,中间远隔“出生之后十年”六个字。看了沈先生的解释之后,我们觉得“期期”不可如此随意解释。(不知道读者是否觉得真的存在沈先生所谓的几种距离之间的“对应”?)上文我们已经讲到,客观时间距离同心理达及距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心理达及某事或某物的距离可能更多地跟事物的内容、获得方式、熟悉程度、情景等有关;当然,跟时间也有很大关系,如果记忆某事物的时间较近,心理达及的距离可能小,如果时间过于久远,心理达及距离可能就大一些,因为人的记忆中的某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直至遗忘。但也有一些事件,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人们达及它的心理距离总是非常短。不过,这里所说的“时间”是指上次记忆到现在所经历的时间,而非沈先生所说的事物之间的相对“时间距离”。语言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其组织自然同人对所表达的某事物的心理达及距离有关,但其关系是否像沈先生所说的那样简单,我们不敢断言。语言的组织要考虑到语法、交际的功能、交际的原则、修辞等方面,不会仅仅根据人们对所要表达的事物的心理达及距离安排。戴浩一曾比较过“跳到马背上”和“在马背上跳”两句话,并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组织句子方面的差异,提出汉语的象似性要比英语强(戴浩一,1994)。可见,不同语言的组织结构同人们的心理达及距离的关系并不相同,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那么我们完全按照心理达及距离安排句子似乎不合道理。我们认为,客观时间距离、心理达及距离和语言接续距离三者之间不存在如沈先生所说的那样的严格关联。有时候,语言的接续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个句子的主语出现在句首还是出现在句中完全出自作者的随意,朱鸿文中每段首句似乎可作如是观。

[美]布朗(M. Neil Browne)和基利(Stuart M. Keeley)在其所著《走出思维的误区》(*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只经过精心驯养的跳蚤,能一听到响动,便从盒子里跳出去。研究人员去掉它的第一对爪子,看对它有什么影响,结果,跳蚤照跳不误;研究人员又去掉它的第二对爪子,不用说,跳蚤同样跳了出去;于是,研究人员索性把跳蚤的最后一对爪子也去掉,这时他看到,跳蚤再也不往外跳了。因此,这位考察家便在本本上写道:‘蚤之脚爪,若刈除净尽,则不复得闻声也!’”(布朗、基利,1996:109)这则故事有许多版本,它提醒每一个读者要仔细辨别竞争性因果假说的重要性。我们觉得,沈先生总结的规律有许多竞争性假说,沈先生似乎未加考虑。

四

现在再来谈一下方法的问题。沈先生偶然看闲书得到的语言实例是否具有典型性呢?按说,沈先生的取例完全是随机的(at random),其典型性可能会大一些,但并不是所有随机性的实例一定都具有典型性,因为随机选择的一个实例,极有可能只是具有个体言语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人言语特点(idiolect)。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讲李白的一段,朱文用了“李白小王维一岁”(a式)而不用“在王维出生一年之后,李白问世”(b式)。沈先生觉得这其中有深藏的规律,若换用句式,在这篇文章里读起来就有点不自然。但笔者的感觉似乎同沈先生相反,倒觉得使用a式反而唐突,因为上一段讲王维,下一段劈头来一句“李白小王维一岁”,反不如“在王维出生一年之后,李白问世”接续得自然。因此,笔者认为,朱文的句式选用有很大的个人言语特点,据此归纳语言中的普遍法则有很大的危险性。

祝畹瑾在论述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如何选择课题时,介绍了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博

夫(W. Labov)的一些经验之谈。“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的语言差异都具有社会意义。拉博夫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差异应当加以区分。一种是不带社会意义的差异,如 cot [kat](小屋;吊床)和 caught [k<t](catch(抓)的过去式形式)两词中的元音,有的美国人加以区别,有的不加区别,都发成[A]音。这类差异只起指示作用,不随语境而变。另一种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差异,如 car(汽车)和 cart(马车)两词中的 r 音,在纽约市发不发卷舌音体现说话人的社会身份,人们对此十分敏感。这类差异起到标记作用,且随语境而变。还有一种差异已经定型,具有一成不变的评估标准,如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的居民把 thirty-third(第三十三)说成 toity-toid,这种说法被视为粗俗形式,人们对其嗤之以鼻。拿变异研究期求达到的理论目标来衡量,第一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的研究价值不大。唯独第二种类型是随着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及说话时的语境而变化的,人们对其不同的变异形式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因而可以从中发现某些普遍性的语言演变规律。”(祝畹瑾 1997:44-45)虽然拉博夫是在讲如何选择社会语言学研究样本,但我们觉得,拉博夫的话适用于任何语言研究中样本的采集。沈先生从朱鸿先生写的文章中所取的例子可能是极具个人语言特点的一种用法,用来说明语言中的普遍性有欠妥当。而且,沈先生仅仅通过这样一个孤证,便下结论说:两种句式的使用同距离象似有关联,这未免太过轻率。如果要消除人们的疑虑,增强所论的可信度,必须有其他的个人言语实例加以佐证。我们期待沈先生再从此结论调查开去,找到其他一些例证时再下结论也为时不晚。黎锦熙先生在其《新著国语文法》的“原序”中说:“例不十,不立法。”我们不期望沈先生能提供十个例证,但我们不能信服他仅仅从一个偶然读到的孤证所得的结论。这其中有太多郢书燕说的成分。

从沈先生所搜集到的实例样本,是否可以得到沈先生所谓的结论呢?我们怀疑。前面曾讲到,沈先生发现了朱文句式使用的规律,即“a、b 两种句式的使用跟前后两个诗人相差的年龄有关系:相差 1-3 岁的,都用 a 式;相差 10 岁以上的,都用 b 式;介于其间的 a 式和 b 式混用,a 式少,b 式较多”。“总的趋势是:出生先后相隔短的用 a 式,相隔长的用 b 式,不长不短的两式混用。”为什么会出现第三种“介于其间的长短”情况呢?原因是有一句话在作梗,即“(八)王之涣小张九龄七岁,是公元 688 年出生的”。我们可以发现,王之涣和张九龄相差七岁,用了 a 句式,而第六句陈子昂和宋之问相差五岁却用了 b 句式,与“出生先后间隔短的用 a 式,相隔长的用 b 式”的规律正好相反。为了缝补自己所发现的“规律”的缺陷,沈先生便总结出了第三种情况:“介于(3-10 岁)其间的 a 式和 b 式混用,a 式少,b 式较多。”这第三种情况的解释随意性可就大了。因此,沈先生便轻而易举地跨越了一道论证障碍,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以设想,如果第八句不存在,沈先生总结的规律就会略微简单整齐一点儿:如“相差 5 岁以上使用 b 句式”云云。

五

行文到此,我们似乎应该仔细反思一下如何借鉴吸收一些外国的语言理论的问题。有一种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的方式是,看到国外一种新理论或新学说,便轻率地编排几个汉语的例证,来说明语言的共性。这一做法的弱点在于不能很好地深入理解剖析国外理论的实质,思考进行创造性发展,而急于应付几个汉语的例证。我们认为,证成语言的共性对普通语言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从某一特定语言研究得出的结论或学说是否具有语言的共性。有时候,有些结论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其中存在许多竞争性解释。对此,我们

不得不审慎地加以考虑辨析,以便使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更加谨严、科学。谨严、科学应该成为语言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但在很多时候,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达到。一个人的思考容有不周,如果能够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互相激励,至于驳难,语言学研究的谨严性和科学性庶几可达,学术之真亦期之有望。

读梁任公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绪言”(作于1924),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爱我者,斥其讹谬,订其阙疑,或赐函见教,或发表于本志通信栏,俾得于成书时悉遵校改以求完善,幸甚幸甚!”任公文思泉涌,行文时多有乖误,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但任公的谦逊自知也是实情。任公以斥其讹、订其谬者为“爱我者”,洵有国士之风。龚自珍曾有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现在冒昧套用一句,“学术正气恃风雷,万笔齐喑究可哀”。学术批评的有无及好坏对于我国的学术建设至关重要。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互相驳难,造就了学术上的一派繁盛,若今日我国学术能有所提高,必得学术批评之帮助不可,没有学者直接的互相批评驳难的激荡,又怎能有我国学术的生气与健康发展!今不揣冒昧,对沈先生的文章献疑,希望能得到沈先生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参考文献:

布朗、基利(1996)《走出思维的误区》,中央编译出版社。

戴浩一(1994)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载《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戴浩一、薛凤生主编),187~217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黎锦熙(2001)《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梁启超(1999)《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

祝畹瑾(1997)《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Hampson, Peter J. & Peter E. Morris (1996)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Kosslyn, S. M., Ball, T. M. & Reiser, B. J. (1978) *Visual images preserve metric spatial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studies of image scanning*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4).

Stenberg, S. (1969) *Memory scanning: Mental process revealed by reaction time experiments* [M]. *American Scientist*, (57). (最后两项文献目录转录自沈文)

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徐思益

一、引言

本文仅根据《论语》语料研讨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开创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长达两千余年,并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代表,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孔子的儒学思想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论语》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从记录孔子简明回答弟子问难和据事说理的表述看,《论语》具有鲜活的时代语感,是春秋晚期活的口语记录,语料的可信度很高。

现存《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记录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者有四百四十四章之多。孔子指名道姓称道他的弟子中有擅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的人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有人说是孔子兴私学、设四科教育他的弟子。这说明“言语”在孔门占有重要地位。“言语”合用在《论语》仅此一见,其他所有篇章都是“言”和“语”分用,其中“言”用了 122 次,“语”用了 13 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答述曰语,自言曰言。”其实,“言”不仅是作动词解,在《论语》中更多的是作名词,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代理解的“说话、言谈”或“话语”。根据《论语》用例,我们认为,孔子谈论“言语”或“言”就是教育弟子在正式交际场合中怎么“说话”“言谈”,把这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教育,当称之为“言语学”。

孔子为什么重视言语,在《论语》很多篇章中教育弟子注重言语交际?这要从当时的社会制度寻找原因。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正是“礼坏乐崩”、西周宗法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诸侯称霸,列国争雄,处士横议,失去了礼法规范,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违反周礼的局面。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提出“非礼勿言”,主张“正名”,企图把当时“天下无道”而搞乱了的名分关系改正过来。他作为兴办私学的教长,就需要培养一批善于言辞的人进行护道宣传。孔子本人就擅长辞令,相鲁时曾在夹谷会上,以大义折服齐景公,使齐归还侵鲁之田(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还记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宪问》)“佞”,指口才捷利。微生亩说:孔丘为什么忙碌不安?要做个口舌之徒吗?说明孔子是善于言辞的。善于言辞的人在当时是有社会用场的。如孔子教育成材而善于言辞的代表人物子贡,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凭借个人言语特长足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由此可见,把言语当成一种专门学问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需要而兴起的。

二、言语范围

言语范围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什么人有权说话,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根据《论语》语料,孔子对言语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

先从什么人有权说话来考察。春秋晚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全面封建制过渡时期,当时社会存在着“人”和“民”两大对立阶级。“人”属于统治阶级,包括周王朝的君主、封建诸侯、陪臣、大夫,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君子、儒士等,他们居于统治地位或社会上层,有说话的权利。“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包括征战的奴隶和从事农耕的平民以及一些手工业者。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纯粹是劳动工具,对于国家大事自然地被剥夺了话语权。孔子谈论的“言语”只限于统治阶级“人”的范围,至于被统治阶级“民”怎样说话的,《论语》无记录;虽有一句逸民“隐居放言”(《微子》),那是破落奴隶主的贵族子弟发牢骚而已,与孔子谈论的言语无关。

再从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来看。孔子是一位恢复周礼、维护西周宗法制度的教长,他教育弟子只谈国家大事一类的话,即关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符合君子人物身份的话,切忌说与此相悖的小人的话。他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即日常生活无聊的闲话;“子罕言利”(《子罕》)。“言利”是小人日常存于心、出于口的话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看来,在当时统治阶级“人”的内部出现了一个“小人”阶层,形成了“君子”与“小人”在认识论、人生观及其道德、言行上相对峙的态势。“君子”是维护西周礼制的守旧者,“小人”则是否定西周礼制的革新者。《论语》在这方面有很多记录。例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天命”,指奴隶制社会宗教神权,“大人”、“圣人”是承奉“天命”的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小人与君子相反,则可以对先王先公的陈腐教条戏玩、辱骂,足见其革新的勇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是对社会矛盾的调和,达到和谐;“同”,是反对调和,主张同一。即君子和小人对解决社会矛盾的认识迥异。“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周”表示普遍,“比”表示偏私。意即君子公道周全,小人只顾及自己私利。“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意即君子经事从自身方面找原因,重视自我修养;小人经事从他人方面找借口,不约束自己。“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指明君子、小人道德修养的差异。“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意即君子心存其善,小人溺恋所居;君子守法,小人贪利,思想境界不同。“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说明君子、小人生活取向各异,等等。孔子应用对举互言的说辞,凸显君子、小人势不两立的态势,因此,他把君子、小人视为臧否人物的尺度,教育弟子以君子为榜样,“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哉樊迟也”(《子路》)。认为学习农耕是劳力的小人做的事,而为劳心的君子所不齿。

概言之,孔子谈论的言语范围仅限于统治阶级“人”的圈子的言谈,不涉及被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的言语生活。在“人”的圈子的言谈,也只限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一类的话,不涉及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他教弟子言语是以君子言行为标准,这是为培养维护礼乐制度的人才而订立的教规。

三、言语观

言语观是指研讨者对言语的性质、作用的认识。孔子把言语作为一门学问教育孔门弟子，他是怎样认定言语的性质和作用的呢？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孔子这句话是从双重否定得出肯定论断，说明从“知言”达到“知人”。常识告诉我们，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言语是人的本性；以言语为媒介，从而达到认识人、了解人。人不是自然物，是有思想感情、道德操守的。通过言语媒介达到“知人”的目的，就是听取人的言谈达到了解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操守，这是孔子这话的本意。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一个说话真诚的人，相信他能够说到做到；对于一个说话虚假的人，不能轻信他说得好，要看他能否践言。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意即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定有供人师法的言语；而花言巧语的人绝没有高尚的道德。这说明，人的德行是通过言语载体表现出来的，言语与德行并非同质。从“知言”是“知人”的媒介观点着眼，孔子进而指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看人应以德行为本，言语为表，就能正确处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

正确理解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就可以凭借言语辨别君子和小人，这是孔子的心意。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这说明，花言巧语、耍小聪明而言语不合时宜的人，难于成为仁者，这都是小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虽难于成为仁者，但如果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差可也能算个次等的“士”（《子路》）。君子必须实践自己的言行，不能说空话、大话。“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言易行难，说话兑现，是第一要务。“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宪问》）这都说明孔子凭借言语表达尊君子、恶小人的一贯思想。

根据以上述说，可以概括出，言语是“知人”的媒介，是德行的载体，这就是孔子的言语观。孔子的言语观有些近似我们现在认识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观点。

言语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根据上述，除了作为“知人”的媒介外，孔子从“慎言”思想出发，扩而充之，在一定意义上说，足以影响国家的兴丧。如孔子回答定公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问题（《子路》），以及“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的表述，就足以证明言语的政治影响力。

四、言谈原则

言谈原则是指说话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不仅失去了言语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而且有失人品身份。孔子的言谈原则是与他的言语观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的。我们根据《论语》记载，辑纳出以下三条言谈原则。

1. 德操原则。文如其人，什么人说什么话，说话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教育颜渊“非礼勿言”（《颜渊》），说话不能违背礼法，这是君子人物言谈的一条政治红线。如果言行超过这条政治红线，孔子都大加斥责“非礼”、“不仁”。如孔子称赞的善于言谈的宰我、子贡，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孔子斥之为“予之不仁也”（《阳货》）；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表示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因为“三年之丧”、“告朔之饩羊”是西周时代的古制，改变古制的言论，不管你讲得多有道理，都是“不仁”和“非礼”。孔子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君子无私欲，不能因人废言，这是做人的品德。孔子指出：“巧言乱德。”（《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这是从反面印证说话必须遵守德操原则。

2. 忠信原则。忠信是指说话要诚实可靠，不说假话。孔子指出，“君子有九思”（《季氏》），“言思忠”是君子应具备的品德。“子张问行”时，孔子教导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这是说，如果说话真诚守信，行为厚道，即使到未开化的地区也能畅通无阻；反之，就是走到本地区也行不通。足见说话遵守忠信原则的重要性。

3. 慎言原则。孔子一贯认为，行为实，言为表，要先做后说，切忌只说而不做。《论语》记录孔子教育弟子慎言的语录很多。例如，“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讷，木讷，意即不会说话的样子；“仁者，其言也切”（《颜渊》），切，忍，说话忍着点，不信口开河；“慎言其余则寡尤”（《子张》）；“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欲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等等。这是君子必须信守的言行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孔子甚至提出“无言”（不说话），认为天地万物非待言语而正常运转生发，以致引起子贡的疑问。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是对子贡多言的告诫，也是“慎言”的极端。

五、言谈方式

说话是一种有目的的言语行为，关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事，既要考虑选用恰当的语句把话说明白，让人听懂；又要根据双方交谈的情景，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让听话人听得进去，理解说话人话语所含的用意。孔子对这个问题有很精要的表述和地道的范例。

（一）言语表达要求

现代修辞学常引孔子一句名言“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作为修辞表达的要求。朱熹《集注》解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皇侃《义疏》说：“言语之法，使辞足达其事而已，不烦美奇其言而过事实也。”两人的解说意思差不多，都从说话人表达要求作出的解说，这符合孔子主张“慎言”、反对“巧言”的思想。其实“辞达”还有通达、传达、“达及他人”（即听话者）的语效含义。例如，“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颜渊》）这句话是说孔子回答樊迟的问话太简略，樊迟没有通达、理解。可见说出的话让对方理解最为重要。如果说话只要求自己“辞达而已矣”，这与孔子赞扬郑国大臣对于外交文书的认真态度的思想相悖。“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一道文书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四道工序，这显然不是人们理解的“辞达而已矣”。

孔子指出，言语表达还有法言、巽言之分，这近乎我们现代语用学所说的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所谓直接言语行为，是指说话者语句准确地、正常地表达出他所说出东西，话语是按字面意义进行的；间接言语行为是指话语委婉一点，绕个弯子，甚至与话语字面意义无关而能表达与直接言语相同的语旨，如很多修辞手法就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子罕》)朱熹注解：“法言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导之也。”孔子这句话的“说”同“悦”；“绎”，指抽绎、推导。意思是说，听到正面的话要听得进去，更要能施行；听到委婉的话不能止于感到悦耳受听，要通过推导，理解话语的用意。如果只听到话语悦耳而不理解其用意，或只停留在听进去而不实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这是孔子对“忠言逆耳”的人的警告。《论语》有一章“巽言”应用的范例：“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理解这章话语的用意先要简介一下卫君和伯夷叔齐的历史身份。卫灵公无道，生前逐走他的儿子蒯聩流亡晋国。他死后，卫国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出公。晋国要拥戴蒯聩回国当卫国国君，新立的卫君出公辄拒绝其父回国正位。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临死时遗命立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要让位其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遂不受位而逃离，叔齐亦不即位而随之逃离。交待了人物历史背景后，现在说这章话语的用意。冉有、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冉有擅长政事，子贡精于言语。当时孔子在卫国，冉有以为他要辅佐卫君辄因而向子贡询问，于是子贡去问孔子。子贡的言语无一字涉问孔子辅助卫君的事，而问的是伯夷叔齐让位的事。他从孔子答话中得到对伯夷叔齐“仁”的评价，从而推知卫君辄拒绝其父回国即位是不仁的行为，得出孔子不会辅佐卫君。子贡用的是巽言，不愧是言语科的高材生。

孔子还明确指出，因环境、条件不同，说话有时可以直接表白，有时需要绕弯子。“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危”作“直”解，“孙”同“逊”解，或如“巽言”的“巽”。这是说，国家有道，就直言直行；如果国家无道，仍可正直做事，但说话进言应谦和委婉，避免无道之君“忠言逆耳”引来灾祸。孔子关于表达要求的这些说辞，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二) 孔子言谈范例

我们前面提到，言谈要根据双方交谈的情景进行，才能收到良好的语效。所谓情景是指与交谈对象出于何种原因，在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下进行交谈。孔子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根据《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恂恂”，温和恭顺的意思。“便便”即“辩辩”，“便便言”意即能说会辩。这是说，孔子在家乡父老面前，表现得温和恭顺很腼腆，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而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的场合，却直言争论，只是说话比较谨慎罢了。“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诒诒如也。君在，蹀蹀如也，与与如也。”(《乡党》)“侃侃如也”，指说话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样子。“诒诒如也”，指说话和颜悦色的样子。“蹀蹀如也”，即恭敬不安的样子。“与与如也”，指小心谨慎的样子。这是说，孔子上朝议政时，与下大夫说话，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当君主在场的时候说话，显得恭敬不安、小心谨慎的样子。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和场合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这是孔子严格遵守“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的“君臣有敬”、“尊卑有序”的周礼制度进行交谈的。

对同一个人说话，因说话人的身份、地位和面对的情况不同，说话也要把握该说、不该说的时机。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愆”指罪过，过失。“瞽”，盲眼。这里的“君子”指有德有权位的人。这是说，侍奉有权位的人，说话要注意避免三种过失：当君子还未说话的时候，你抢先说话，就是急躁失礼；君子已经说到了，你还不开口附和，就是隐瞒自己的看法；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